

爲「新亞精神」進一新解

余英時先生

我第一次參加新亞的畢業典禮是一九五二年的七月七日，離今天已是整整二十二年了。那時我和今天的諸位同學一樣，正是處在離開學校、踏入社會的交界點上。雖然事隔二十二年，但當時畢業典禮的種種情景現在仍一一浮動在我的眼前。諸位同學們大概都知道，一九五二年的新亞書院是在桂林街。那時我們不但沒有禮堂，並且也沒有像今天這樣的體育館。換句話說，那時的新亞根本沒有自己的校舍。我清楚地記得，我的畢業典禮是在香港海邊的一家旅館——六國飯店——裡舉行的。使我更不能忘記的，是我畢業的時候連校長也沒有能來參加。爲什麼呢？那一年的四月，新亞的校長（當時稱爲「院長」）錢賓四先生在台北講演，不幸因講堂屋頂上水泥塌落而被壓重傷。所以在畢業典禮的那天，錢先生還在台中休養，無法趕回來主持。錢先生去台灣，一方面固然是爲了作學術演講，但另一方面則是因爲當時新亞的處境太過於艱困，希望可以爭取一點香港以外地區的教育和文化界的支持。

我叙述這一段往事，是爲了給新亞的今昔作一個鮮明的對比。從物質條件和學校規模來說，這二十二年來，新亞的面貌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那麼，新亞在精神方面是不是也有今昔之別呢？這個問題很不容易回答，主要得看我們怎樣去理解「精神」兩個字。多少年來我們常常談到所謂「新亞精神」。但是究竟什麼是「新亞精神」，恐怕今天沒有人能夠下一個權威性的界說。我回到新亞已經一年。在這一年中，我從來沒有正式宣揚過「新亞精神」。我之所以對這個大問題保持緘默，並不表示我對「新亞精神」已失去信仰，而是因爲我需要有一段時間來觀察和反省，看看經歷了二十多年的時間，「新亞精神」究竟還存不存在？如果存在的話，又發生過什麼變化沒有？現在我願意趁這個機會來談一談我個人在過去一年中觀察和反省的結果。

答案先說：「新亞精神」仍然存在，但是確已起了深微的變化。根據我的理解，精神具有變與不變的兩個方面：就精神所寄托的具體內容說，精神是受外在環境和物質條件限制的。因此環境與條件的變化必然會引起精神內容的變化。但是就精神自身的方向說，則精神又是不變的。如果方向變了，則表示這種精神已爲另一截然不同的精神所代替，而無復本來面目了。

我肯定「新亞精神」仍然存在，是因爲我們的基本方向並未改變。我認爲「新亞精神」已發生了深微的變化，是因爲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外在環境和物質條件已與新亞初創時完全不同了。

二十二年前，我在第一屆畢業同學「臨別的話」中說道：「我們的師長們，爲了一種高尚的文化目的，在香港創辦了新亞書院；而我們同學們也是爲了要瞭解祖國的文化歷史以及未來的人類前途，而踏入了新亞的校門。」「瞭解祖國的文化歷史和人類前途」，這是我自己在畢業的時候所認識的「新亞精神」的基本方向。二十二年後的今天，我相信這仍是新亞師生所共同堅持的方向。新亞書院自始便不是一間普通的現代教育機構，她有自己獨特的立場。這個立場，簡單地說，便是一切從中國出發而又歸結到中國。更重要地，我們所謂的中國並不限於政治學上的狹義的國家觀念，我們強調的是那個內容豐富、源遠流長的文化的中國。我們從中國出發，因此我們認知的對象便不能限於中國或限於過去；一切有助於中國現代化的新思想和新學術都在我們尋求

的範圍之內。我們歸結到中國，因此我們的治學便不致流為「遊騎無歸」或「智性遊戲」。二十多年前新亞師生一方面探討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而另一方面又關懷世界文化的新生，這便明確地指出了「新亞精神」的方向。而這個方向，在今天則是更清楚地呈現在我們的眼前。

但是「新亞精神」的方向雖然未變，「新亞精神」所寄托的具體內容則已迥異往昔。舉其最顯著者，至少有以下三點：第一，新亞校歌裡所說的「亂離」、「流浪」、「艱險」、「困乏」，的確反映了創校初期新亞師生對當時的外在環境和物質條件的真實感受。就這一點說，今天的新亞已大不相同。現在我們在香港這個環境中基本上已安定了下來，在物質方面也已脫離了困境。第二，早期新亞只有四個學系，而且重心是偏在人文方面：現在我們已發展到三個學院，十幾個學系，包括文、理、法、商各種基本學科。第三，新亞創立之初，師生一共不過二三十人，而今天我們師生的總數已在一千人以上。

這些顯而易見的巨大變化無可諱言地會影響到、並且已不斷地在影響着「新亞精神」的發展。「安定」和「免於匱乏」自然是正面的價值，但也帶來了副作用：即沖淡了開創時代的憂患意識。課程範圍的擴張是近代大學教育應有之義，但院系的不斷增添則難免要造成門戶之見，加深隔膜之情，使得原始新亞精神中「殊途同歸」、「百慮一致」的企求愈來愈高不可攀。師生人數的膨脹更是新亞教育事業蒸蒸日上的一個明證，然而仍然不是沒有代價的。最明顯的是早期那種和睦的「家庭」氣氛逐漸為一種組織化、制度化的「客觀」關係所代替。我們對於上面所列舉的各種變化不必有太多的感慨。這些變化可以說是新亞發展所必經的過程。我們不能存「眼前無路想回頭」之念；因為前面的路需要我們不斷地開闢，而回頭才真是沒有路。問題在我們怎樣能夠一方面認清今日新亞的客觀處境而另一方面又不迷失「新亞精神」的方向。祇有認清新的客觀的處境，我們才能够對新亞精神作一種適當的內在調整，使它可以循着原來的方向穩步前進。

照我以上的分析，今天新亞具有三個主要的客觀條件，這三個條件可以概括地稱之為「環境安定化」、「學術分工化」和「關係制度化」。「安定」可以使我們沉潛，「學術分工」可以使我們樹立多元的文化價值觀，而「制度化」則可以使我們在對人對事方面發展出一種客觀冷靜的態度。這樣，我們便把客觀的物質條件轉化為主觀的精神條件了。通過這一轉化，「新亞精神」的方向也就重新得到了保證。照我所了解的「新亞精神」的方向，首先是在「瞭解祖國的文化歷史和人類的前途」。在這一艱苦的認知過程中，我們所需要的精神原素正是「沉潛」、「客觀冷靜」和「多元價值觀」。

新亞的校訓是「誠明」兩字。「誠」屬於道德的範疇，「明」屬於知識的範疇。在中國的傳統思想中，誠與明是互為前提的，其間本無先後輕重可說。但新亞是一個教育機構。「中庸」上說：「自明誠，謂之教。」所以從教育的觀點說，我們的功能首在能「明」。用近代的話來解釋，「明」就是追求真理——包括人文、自然、社會各方面的真理。但人不是離開時空的抽象存在。新亞是中國人的學校，因此我們在這裡追求真理同時又必須是一切從中國出發而最後又歸結到中國。這裡面則包涵着一種崇高的道德精神，即我們的校訓中所謂之「誠」。

早期「新亞精神」所遭遇到的最大障礙是物質上的「艱險」和「困乏」，這祇是王陽明所謂的「山中賊」。相反地，今天「新亞精神」的最可怕的敵人是因環境安定而產生的懈怠和麻痺，但這則是王陽明所謂的「心中賊」。「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我們應該三復這位提倡「知行合一」的思想家之言！